

三晋古文化源流

绪 论

第一节 关于“三晋古文化”之称谓

本书提出并使用了“三晋古文化”称谓，以之作为对西周至春秋时代的晋国文化和战国时代魏、韩、赵三晋国家文化的统称；通常，晋国文化与三晋国家文化又分别简称“晋文化”与“三晋文化”在这个意义上，“三晋古文化”便是“晋文化”与“三晋文化”的统称。为什么有这个必要呢？这主要是因为：

山西古代文化史上有一个独特的现象，就是自西周初年叔虞封唐，建立晋国，到春秋末年发生了“三家分晋”事件，姬姓贵族统治的晋国从此灭亡，由魏、韩、赵三个独立的异姓诸侯国取而代之。这在列国中是绝无仅有的。如齐国，虽曾于战国初年发生了田（陈）氏取代姜氏执掌国政的重大变故，但却不曾更动齐国国名；再如鲁国，也曾于春秋末年有过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三分公室”进而“四分公室”之事，瓜分了鲁

国国君的土地和奴隶，实际执掌了鲁国的军政大权，但是，三家皆不曾登上君位，自然也不曾更动鲁国国名。唯独晋国分裂为魏、韩、赵三国，并且是屹立于战国七雄之林的三大强国，这就给研究山西古代文化的发展带来复杂性，提出了一个无可回避的文化称谓问题。也就是说，究竟应当用什么样的称谓去表述晋国文化与三晋国家文化的总体内涵，便成了首先面临的一个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近年以来，伴随着对中国古代地域文化研究热的兴起，“晋文化”与“三晋文化”称谓被人们广泛应用，也由此出现了种种不确定性的涵义。尤其是在人们的流行用语中，它们往往被笼统地当作山西古代（甚或近现代）文化的代称或简称；如同人们习惯于以“晋”或“三晋”代称或简称山西省一样，举凡山西地区的传统文化，往往冠之以“晋文化”或“三晋文化”的称谓。即便是在学者们的学术用语中，每当论及晋国与三晋国家的文化时，有的往往概称之“晋文化”，有的又往往以“三晋文化”概称之。笔者觉得，凡此种用语或称谓，如不予以明确界定，恐皆有损于概念的完整性和准确性。有鉴于此，笔者特地提出和使用“三晋古文化”称谓，以之作为对“晋文化”与“三晋文化”的统称。这样不但可以比较完整地表述晋国文化与三晋国家文化的总体内涵，而且也便于行文，是我们正确把握西周至春秋战国时代山西地区文化发展的必要前提。

还应当指出，西周至春秋时代的晋国文化（“晋文化”），与战国时代的魏、韩、赵三晋国家文化（“三晋文化”）正如同一篇文章的上篇和下篇，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

一方面，魏、韩、赵三晋国家原本是由晋国分裂出来的三个独立诸侯国，三晋国家的始祖，均系长期握有晋国经济政治和军事实权的世袭卿族。并且，按照宗法关系，魏、韩两国先

祖本与晋公室同姓，属于姬姓宗族系列，后从其封地之名而分别改姓魏、韩，由此成了晋公室的异姓；赵氏之先，与秦共祖，嬴姓，与晋公室不同宗，但却是晋国历史上声势最为显赫的异姓强族。更重要的是，独立后的魏、韩、赵国家，其社会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始终保持着与晋国一脉相承的历史渊源关系，实际是晋国社会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在战国时代的历史延续，也是晋国社会发展的必然历史趋势。从这个意义上说，晋国文化与三晋国家文化是属于同一历史序列不同发展阶段的一个有机的地域文化体系。

另一方面，从晋国与三晋国家的地理界域看，西周初年晋国始封时，其疆域限于今山西晋南“河、汾之东，方百里”之地；进入春秋时代，晋国疆域逐步超出今山西省境向外延伸；到了战国时代，魏、韩、赵国家的疆域又处于不断扩展变化之中。由此看来，晋国与三晋国家的地理界域，大体上是以今山西省境为中心而呈四面辐射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晋国文化与三晋国家文化又是属于同一地理界域不同历史时期的一个有机的地域文化体系。

因此，晋国虽然被分为三个名称不同的独立国家，但是，无论就时间区间、历史序列或空间区间、地理界域而言，晋国文化与三晋国家文化正如同由上、下两篇而组合成为一篇文章那样，是不可分割的同一地域文化体系的有机构成部分，这一地域文化体系，我们统称之为“三晋古文化”体系。也可以这样说，晋国文化（“晋文化”）属于“三晋古文化”体系的初级形态，三晋国家文化（“三晋文化”）是其达到高度成熟的形态。

总之，笔者提出和使用“三晋古文化”称谓的主旨是，基于概念的严密性和准确性，故凡西周初年晋国始封前山西地区的远古文化，以及战国末年秦王朝统一中国后山西地区的封建文化，皆不宜使用“晋文化”或“三晋文化”概念作称谓；也

就是说，“晋文化”概念乃是对西周至春秋时代晋国文化的确指，“三晋文化”概念则是对于战国时代魏、韩、赵三晋国家文化的确指；在这个意义上，作为“晋文化”与“三晋文化”之统称的“三晋古文化”的发展序列，其确定的时间区间限于西周初年至战国末年晋国和魏、韩、赵三晋国家实际存在的历史阶段。那么，西周以前和战国以后这两大历史阶段山西地区的文化发展序列又当如何予以界定呢？这个问题，我们将在“关于三晋古文化研究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一节中具体阐释。

第二节 晋国与魏、韩、赵国家 历史和疆域沿革

晋国与魏、韩、赵国家的地理界域或疆域，随着历史的推移，到了春秋和战国时代，处于不断向外拓展和变化之中，其总体轮廓大致是以今山西省境为中心而呈四面辐射状：东面涉及今河北省西南部，南面涉及今河南省北部和中部直至今山东、江苏省部分地区，西面涉及今陕西省东部沿黄河一带地区，北面涉及今内蒙古自治区长城内外部分地区。其中，在今山西境内，晋南古河东地区不但曾是晋国的策源地和腹心之地，而且也是魏、韩、赵三晋国家的策源地，因此，这里自然成为“晋文化”与“三晋文化”的主要载体，也就是“三晋古文化”的主要载体。

一、晋国历史和疆域沿革

西周初年，晋国第一代国君姬虞（叔虞）被封于古唐国，称为唐侯。古唐国在哪里？历代学者曾经有过争议。司马迁的《史记·晋世家》说：“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故曰唐叔虞。”

按这个说法，古唐国大约就在晋南地区汾河与浍河之交的今翼城、曲沃、襄汾、绛县、闻喜、侯马、新绛之间方圆百数十里的范围。

晋国的都城有几处？各在什么地方？学者们对此也有过不同的说法，其中曾有“晋国七都、六迁”之说（见邱文选《晋国七都六迁始末》，《晋阳学刊》1982年第5期）。现在看来，晋国的都城有早期和晚期两处，其所在地也有比较确定的地下文物印证。

晋国的早期都城称“绛”或“故绛”，也称“翼”，或称“唐”。其所在地是哪里？根据考古发掘，特别是“天马——曲村遗址”的发掘，为确定晋国早期都城所在地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它证明，晋国早期都城就在今翼城、曲沃之间的天马——曲村遗址所处地区。天马——曲村遗址的文化年代，其上限为西周初年，下限为春秋中期。就是说，这里从西周初年叔虞封唐时建都，直至春秋中期晋景公时迁都，一直是晋国的政治文化中心。

晋国的晚期都城在哪里？《左传·成公六年》记载了晋景公时酝酿迁都的大致经过，说：

晋人谋去故绛，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饶而近盩，国利君乐，不可失也。”韩献子……对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浅，其晋易觐；易觐则民愁，民愁则垫隘，于是乎有沈溺重腿之疾，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浍以流其恶，且民从教，十世之利也。夫山、泽、林、盩，国之宝也。国饶，则民骄佚；近宝，公室乃贪，不可谓乐。”公说，从之。夏四月子丑，晋迁于新田。

这说明，晋国在决定都城迁往何处的问题上曾经有过争议。多

数人主张应迁往今运城市解州镇西北的郇、瑕之地，因为那里土地肥沃，且靠近盐池，不但对国家有利，也是国君一大乐事。唯独韩献子（韩厥）力排众议，认为郇、瑕之地土薄水浅，气候潮湿，容易染上恶疾，给民众造成痛苦，不利于治理国家。他明确主张应当迁往今侯马市所在地新田，这里土厚水深，气候干燥，又有汾、浍二河畅流其间，民众没有疾病之苦，也就比较服从教化，这对于治理国家来说，可谓十世之利也；并且，山、泽、林、盐这些物产固然可以使国家富饶，但富饶的物产也会造成民众的骄奢淫佚心态，最终依然不利于国家，因而对国君并非乐事。于是，晋景公愉快地采纳了韩献子的主张，决定把都城迁往新田。迁都以后，晋人又称新田为“绛”，称旧都为“故绛”相对于“故绛”，新田自然也被称为“新绛”。

新田作为晋国的晚期都城，已有丰富的地下文物印证，这就是考古发掘的“新田遗址”。也称“侯马晋国遗址”或“侯马晋国都城遗址”。该遗址的文化年代，上限为春秋中期，下限为战国早期三家分晋后的 30 年左右。也就是说，自从晋景公迁都，直至晋国灭亡，新田一直是晋国的政治文化中心。

因此，把天马——曲村遗址与侯马晋国遗址联系起来，从其年代序列来看，几乎包括了晋文化发展的全部过程，即西周初年至韩、赵、魏三家分晋后的 30 年左右，从而初步建立了晋文化考古学标尺，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探讨晋文化打下了基础（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考古四十年》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 142 页。以下凡引，只注书名和页码）。

《史记·晋世家》写道：

唐叔子燮，是为晋侯。晋侯子宁族，是为武侯。武侯之子服人，是为成侯。成侯子福，是为厉侯。厉侯之子宜臼，是为靖侯。靖侯已来，年纪可推。自唐叔至靖侯五世，

无其年数。

这就是说，唐叔虞死后，其子燮父继位，将国号由唐改为晋，从此有了“晋国”之称号。但是，直至第六代国君晋靖侯“无其年数”，史书没有关于他们在位的具体年数记载；而且，在整个西周时代，晋国的地理界域也不曾有过大的变化，基本上依旧活动于“河、汾之东，方百里”的古唐国领域。

进入春秋时代后，晋国随着其国力的不断增强，展开了频繁的对外兼并战争，于是，晋国的疆域版图一步步扩大，进而跨越今山西省境向周围地区拓展。其中，标志晋国国力增强和疆域版图扩大的重大事件主要发生在以下几个历史时期：

其一，西周与东周之交的晋文侯时期。晋文侯在位期间（前 780 至前 746），西周王朝已濒临亡国的前夕。当时，西周末代国君周幽王荒淫无道，废掉皇后申后和太子宜臼，于是，申后之父申侯联合缙侯以及西戎和犬戎势力，攻陷国都镐京，于骊山下杀掉幽王，并杀死幽王欲立为太子的庶子伯服，拥立太子宜臼为周平王。平王即位后，西戎、犬戎已逼近镐京，屡次侵扰；幽王余党虢石父又另立幽王庶子余臣为王；同时，经过战乱，镐京也已残破不堪。面对这种情况，周王室显然难以在关中地区立国，于是决定将京城迁往东都洛阳。从此，西周宣告灭亡，进入东周时代，也叫春秋时代。在平王东迁过程中，晋文侯亲率大军入陕，与郑武公、秦襄公合力勤王，护卫平王完成了东迁，稳定了东周初年的局势；同时，文侯又杀掉非法占据王位的余臣，结束了长达 10 年之久的二王并立局面。可见，在西周与东周交替的危难时刻，晋文侯对于东周王朝实有再造之功。为此，周平王特地作了《文侯之命》这篇文诰见《尚书·周书》，以示表彰嘉奖晋文侯勤王的不朽功勋。所以，晋文侯是晋国历史上的一位杰出的君主，他的文治和武功，对于增强晋国的国力，提

高晋国的国际地位，起了重要的奠基作用。

其二，春秋前期的晋武公、晋献公和晋文公时代。晋武公继承其祖曲沃桓叔、其父曲沃庄伯的遗志，以小宗取代大宗的方式，消灭了自西周以来长期统治晋国的旧公族势力，结束了晋国六七十年之久的内乱，使晋国复归统一，并在此基础上，开始进行对外兼并，进一步增强了国力，扩大了疆域版图。晋武公之子晋献公继位后，更加雄心勃勃，决意“继文（侯）绍武（公）”与诸侯争雄，并在全力整顿内政、治理丧乱之余，展开了更大规模的对外兼并，消灭了众多的周边国家，大大拓展了晋国的疆域版图。

在西周初年叔虞封唐前后，还有许多周室贵族被封到晋南地区，星罗棋布于晋国周围。到了春秋前期晋武公、晋献公时代，这些周边国家的相当多数已被晋国所兼并，成了晋国本土的组成部分。其中，晋献公在位期间先后兼并的周边国家主要有：

霍国，在今山西霍州市境内。晋献公灭霍后，晋国疆域遂即扩展到了晋南地区的北部边沿。

虢国，在今山西平陆县和河南三门峡市境内。灭虢后，晋国疆域又跨越黄河而伸向了今河南省境。

虞国，在今平陆县境，与虢国相毗连。晋献公准备灭虢时，先以赠送虞君“屈产之乘（名马）”和“垂棘之璧（美玉）”为诱饵，提出“假道于虞以伐虢”的要求，虞大夫宫子奇极力谏阻虞君说：“虞之与虢，唇之与齿，唇亡则齿寒。”意思是虞、虢两国有如唇齿相依的兄弟之邦，一但虢国灭亡，虞国自然不保。但虞君不听。果然，晋军在灭掉虢国后，挥戈北击，吞并了虞国（见《史记·晋世家》）

魏国，在今山西芮城县境。

耿国，在今山西河津市境。

除上所述，还有在晋武公时代被吞灭的郇国，在今山西临猗县境；董国，在今山西闻喜县境；贾国，在今山西临汾市境。同时，还有在晋武公之前被吞灭的几个小国如冀国，在今山西河津市境；韩国，在今山西河津、万荣之间；杨国，在今山西洪洞县境。此外，还有已被晋国吞灭而无地域可考的沈、姒、葑、费等几个小国。总之，晋国发展到晋献公时代，其地理界域已经大大突破“河、汾之东，方百里”的范围，不仅覆盖了几乎整个晋南地区，而且跨越今山西省境到达今河南豫西部分地区了（见李孟存等：《晋国史纲要》，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 第23~26页）。

继晋献公之后，晋文公不仅开创了晋国百年霸业，使晋国一跃而为长期称霸春秋的第一流强国，而且更大幅度地拓展了晋国领土。公元前642年，第一个称霸华夏诸侯的齐桓公死去，中原霸主地位空落。文公即位（前636）后，立志开创晋国霸业。恰在这时，周王室发生内乱，周襄王弟弟太叔带联合狄人赶走了襄王，篡夺了王位。襄王出奔郑国，遣使向晋国和秦国告急。秦穆公闻讯，立即起兵屯于河上（属晋地）前往救援。鉴于此，晋大夫赵衰向文公建议：“求霸莫如入王尊周。周晋同姓，晋不先入王，后秦入之，毋以令于天下。”（《史记·晋世家》）他认为这是开创晋国霸业的难得机会，不可放弃。于是，晋文公即以“尊王攘夷”相号召，借此“令于天下”；图谋称霸大业。并立即通告秦国，请其回师，晋国兵分两路，日夜兼程，一路打败了狄人，杀了太叔带；一路迎接襄王回京师洛阳复位，终于平定了叛乱，挽救了周室危机。因勤王有功，“襄王以河内赐晋文公”（《汉书·地理志下》），就是把称为“畿内八邑”的阳樊、温、原（今属河南济源县）州、絳、緄（今属河南沁阳县）、鉏、欃茅（今属河南修武县）划归晋国版图，以示嘉奖。从此，晋“始有河内之土”（《汉书·地理志下》）晋国的地理界域由此扩展到了今

河南豫北地区。以上八邑均位于黄河北岸，大多是太叔带控制下不肯听命的封邑，划归晋国版图后，便成了尔后晋国出兵中原的前沿阵地。

其三，春秋中期的晋景公、晋悼公时代。晋国立国后，“戎狄与之邻”（《左传·昭公十五年》）；“戎狄之民实环之”（《国语·晋语二》），周围分布着众多戎狄民族。但是在文公以前，晋国对外扩张兼并的目标主要是它周边的十几个华夏诸侯小国，对戎狄民族采取防御与和睦共处的政策。春秋中期晋景公即位后，开始对戎狄民族大规模兼并，从此，随着晋国国力的不断增强，环绕在它周围的戎狄民族一个个都被吞灭，晋国也由此不断扩大了自己的疆域版图。

景公在位期间，对晋国威胁最大的主要是分布在山西东南部及其与河南、河北交界地区的赤狄民族，于是，景公首先发动了对赤狄的战争，经过六七年的征讨，先后消灭了赤狄各部，晋国疆域也随之由晋南地区拓展到了晋东南及其临近的河南、河北部分地区。

正当晋国大举兼并戎狄的时候，当年在城濮之战中被打败的楚国又乘机卷土重来，北上与晋国争霸，同时，晋国国内矛盾也空前激化，处于内外交困之中，霸业面临着严重危机。晋悼公即位后，为了重振晋国霸业，不得不与戎狄建立睦邻关系。于是，在大夫魏绛的建议和主持下，采取了著名的“和戎”政策，派遣魏绛北和诸戎，使其对晋国称臣纳贡，和睦相处。这不但解除了晋国与楚争霸的后顾之忧，为重振晋国霸业创造了条件，而且进一步拓展了晋国领土，从此，晋国即开始在霍山以北设置县邑，晋国的地理界域也由此而跨出晋南地区不断向北推移。

其四，春秋晚期晋平公及其以后的时代。晋国发展到晋平公时代，政权落八魏、韩、赵、智、范、中行氏六大卿族之手，

六卿经过长达一个世纪的较量，范、中行氏和智氏先后被消灭，最后导致魏、韩、赵“三家分晋”，进而“三家灭晋”。在这漫长的历程中，六卿为发展各自的实力和维护晋国的霸业，一方面展开了激烈的对内争夺，一方面发动了大规模的对外兼并。到三家分晋之际，环绕晋国周围的众多华夏小国和戎狄部族，基本上都被晋国吞灭，晋国的疆域版图也随之达到极盛，业已据有今山西南部、东南部、中部和北部部分地区，今河北西南部和西部部分地区，今河南北部和西部、中部部分地区，以及今陕西东部部分地区，由此形成了以今山西省境为中心而向相邻省境辐射的晋国地理界域格局。为了统治被征服的广阔地区，晋国在边远地区设郡，在内地设县，这是我国古代郡县制的先声。三家分晋后，雄踞战国之林的魏、韩、赵三强，又在更广阔的范围进一步拓展了自己的疆域版图。

二、魏国历史和疆域沿革

魏氏是晋国六大卿族之一，其先祖与周同姓，属于同一个宗族系列。据《史记·魏世家》记载：

魏之先，毕公高之后也。毕公高与周同姓。武王之伐纣，而高封于毕，于是为毕姓。其后绝封，为庶人，或在中国，或在夷狄。其苗裔曰毕万，事晋献公。

就是说，毕公高本为姬姓，武王灭纣以后被封于毕，遂从其封地而姓毕。按《左传》的说法，毕公高是西周初年陆续分封的众多周族子弟之一，属于“文之昭”，即周文王之庶子（见《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毕姓“其后绝封，为庶人”，故西周时代不显毕氏的活动。毕公高的封地毕，又称毕原，是周王室的同姓诸侯小国，其地在今陕西长安县西北，与西周国都镐京相近。

春秋时代，毕公高后裔毕万事晋献公，为晋国大夫，晋献公的重臣。晋献公即位后大举对外兼并，先后吞灭了众多周边国家。《史记·魏世家》说：

献公之十六年，赵夙为御，毕万为右，以伐霍、耿、魏，灭之。以耿封赵夙，以魏封毕万，为大夫。

当时，晋国军队的最高统帅是国君，两国交兵，国君一般要御驾亲征。为国君驭车的人称“御戎”或“御”，立于战车左侧；国君居中，以旗鼓指挥全军的进退；立于国君右侧、执戈盾进击敌车者称“戎右”或“右”。毕万便担任戎右之职，因其随从献公征战有功，献公灭魏后封毕万于魏，授以大夫之爵。魏也是周室的同姓诸侯国，在今山西芮城县境。毕万封魏 11 年后，晋国因献公死而发生争夺君位的内乱，“而毕万之世弥大，从其国名为魏氏”（见《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这就是晋国魏氏的来源，也即魏氏卿族势力的发祥地和第一个治邑。

毕万之子名魏犇，号魏武子。晋文公重耳为公子时，“魏武子以魏诸子事晋公子重耳”（《史记·魏世家》）是重耳的亲信。晋献公晚年发生“骊姬之乱”，魏武子随从重耳出亡在外 19 年，重耳回国被立为国君后，“令魏武子袭魏氏之后封，列为大夫，治于魏”（《史记·魏世家》）。

魏武子之子号魏悼子，悼子承袭父爵后，将治邑由魏迁至霍（今山西霍州市境）。

魏悼子之子名魏绛，号魏昭子，为晋悼公时大夫，他以其辉煌的文治和武功，对悼公重振霸业作出了卓著建树，尤其是著名的“魏绛和戎”，开创了中国古代民族文化融合的光辉范例。他承袭父爵后，又将治邑由霍迁至今山西夏县境内的安邑。从此，安邑成为春秋时代魏氏卿族势力的大本营和战国时代魏国

的策源地。

魏绛之子名魏舒，号魏献子。魏氏势力在魏献子期间获得重大发展。晋国自晋平公时代起，形成六卿联合专政局面；晋昭公卒后，“六卿强，公室卑”；晋顷公时代，魏献子登上卿位，居六卿之首，为正卿，执掌晋国国政，当时，“六卿欲弱公室，乃遂以法尽灭”晋国最后两个旧公族祁氏和羊舌氏，并“分其邑为十县，各令其子为大夫”，在我国历史上首次推行了具有封建内涵的县制，各派本族子弟为县大夫进行治理。从此，“晋益弱，六卿皆大”（见《史记·晋世家》）。

魏献子之子名魏侈，号魏襄子。晋定公时代，魏襄子与赵、韩、智氏联合攻灭范、中行氏，从此，晋国六卿专政局面由四卿所取代。

魏襄子之子名魏驹，号魏桓子。晋定公时代，魏桓子与赵、韩、智氏共分范、中行氏之地以为邑，晋国实际上为四卿所瓜分；晋哀公时代，魏桓子又与赵、韩二氏联合攻灭智氏，瓜分其地，从此，晋国形成魏、韩、赵三卿鼎足而立的局面。

魏桓子之子名魏斯，即魏文侯。晋烈公时代，“周威烈王赐赵、韩、魏皆命为诸侯”（《史记·晋世家》），从此，晋国名存实亡，形成了以魏文侯（斯）、韩景侯（虔）、赵烈侯（籍）为开国君主的魏、韩、赵三个独立诸侯国，史称“三家分晋”。

魏文侯之子名魏击，即魏武侯。晋国最后一位国君晋静公初年，“魏武侯、韩哀侯、赵敬侯灭晋后而三分其地。静公迁为家人，晋绝不祀”（《史记·晋世家》）。从此，晋国历史宣告终结，史称“三家灭晋”。

综上所述，晋国魏氏卿族自晋献公时封毕万于魏，“从其国名为魏氏”至晋悼公时魏绛将治邑迁徙至安邑以来，一直是以魏、安邑二地为其活动中心，并已经占据了今山西晋南运城地区的大部分土地。三家分晋后，魏氏形成独立国家，安邑即成

为战国时代魏国的第一个都城；三家灭晋后，晋国的都城新田（今属侯马市）及其第二大都邑曲沃皆归属魏国，因此人们有时又称魏国为晋国。

魏国在魏文侯、魏武侯和魏惠王时代国势达到极盛，疆域版图大幅度拓展，并在攻取了今河南东部原属郑国的部分领土后，为图谋在中原地区发展，遂于魏惠王九年（前 361）由安邑迁徙至大梁（今属开封市）从此活动中心发生了转移。

魏国疆域最大时，其西部曾到达今陕西境内原属于秦国的黄河以西、洛河以东以北地区，魏文侯在攻取了秦国的这片土地后，分别设置了西河郡和上郡：西河郡相当黄河与南洛河之间南至华阴、北至黄龙一带；上郡相当黄河与北洛河之间到达子长、延安等地。在战国时代，各国的郡一般设在边地，主要起巩固边防的作用，魏文侯设置西河郡和上郡，便是为着防御秦国的。

魏的北部边沿到达今山西中部地区，魏文侯时还曾一度北越赵国，攻灭了今河北正定一带白狄族鲜虞部建立的中山国。

魏的东北部曾伸向今河北大名、广平和山东冠县一带。

魏的东部总称“东地”，主要包括两大块：一是今河南北部原属卫国的大部分领土，不断为魏国所占领，这一带位于黄河以北，故称“河内”；二是今河南东部原属郑国的大梁一带地区。

魏的东南部更伸向今山东、江苏、安徽、河南交界处地区，这一带原属宋国领土，齐灭宋以后为齐占有，魏昭王时攻取其地，分别设置了方舆郡和大宋郡：方舆郡相当今山东嘉祥以南之金乡和江苏丰县一带；大宋郡相当今河南商丘和安徽砀山。

魏国的策源地在古称河东的今山西晋南地区，这里本是魏的腹里之地或内地，但魏惠王在西河郡和上郡重新被秦夺回，黄河天险丧失后，为了巩固西部边防，抵御秦的侵扰，遂在晋南沁水以西、霍山以南地区，设置了河东郡。因此，相对于“东

地”而言，河东便属于魏的西部疆域了。

由上可见，魏国疆域比较分散，主要集中于今山西晋南河东地区和今河南豫北、豫东的河内和大梁一带，明显地分为东、西两部分；东、西两地之间以今山西晋东南上党地区为交通孔道而相连，呈一个向北凸起向南凹陷的葫芦形，大体上类似于一个人体的胸腔部位。魏国的四邻分别是：东为齐，南为楚，西为秦，北为赵；与魏接壤的韩国疆域，大部分被囊括进魏国东、西两地形成的葫芦形胸腔之内，好比人体的咽喉一样。所以，《战国策》形容道：“韩，天下之咽喉；魏，天下之胸腹。”（《战国策·秦策四》）颇为形象地描绘了韩、魏两国疆域形态的特点。

三、韩国历史和疆域沿革

作为晋国六大卿族之一的韩氏先祖，确知其名的叫韩万，号韩武子，据说也是周王室的同姓宗族，姬姓。《史记·韩世家》写道：

韩之先与周同姓，姓姬氏。其后苗裔事晋，得封于韩原，曰韩武子。武子后三世有韩厥，从封姓为韩氏。

《史记》明确指出了韩武子、韩万是晋国韩氏卿族的创始人，因其封于韩原而为韩姓。但《史记》的说法有三点需作分析：

其一，韩武子究竟是谁的后裔？据《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记载，西周自武王至成康之世曾陆续分封了 26 个同姓诸侯，其中“文之昭”16 人，“武之穆”4 人，“周公之胤”6 人；韩侯属“武之穆”4 人之一，系武王之子，其名不详。如此说来，韩武子应是韩侯之苗裔。但《史记·索隐》指出：

按《系本》及《左传》旧说，皆谓韩万是曲沃桓叔之

子，即是晋之支庶。又《国语》叔向谓韩宣子（起）能修武子之德，起再拜谢曰“自桓叔已下，嘉吾子之赐”，亦言桓叔是韩之祖也（见《史记·韩世家》）

根据这个说法，后世学者多认为，韩氏卿族的创始人韩武子，并非西周初年周武王之子韩侯的苗裔，而是春秋初年晋国曲沃桓叔一支的庶系（小宗）公族，即曲沃桓叔之庶子。

其二，韩原究竟在何处？有三种不同的说法：《括地志》、《通志》皆认为在今陕西韩城；《后汉书·郡国志》说“河东郡河北县有韩亭”认为在今山西芮城；江永《春秋地理考实》则认为在今山西河津、万荣之间。后世学者多认为江永的说法比较可靠。这就是说，今河津、万荣间的韩原即是西周初年分封的古韩国所在地（见《晋国史纲要》第 35 页）。

其三，古韩国自西周初年立国后，周厉王时曾经失国，宣王中兴时又复国，至春秋初年终于被晋文侯所灭。随后，晋国发生“曲沃代翼”事件，韩万作为曲沃一族，曾经为御戎，立有战功，晋武公即位后被封于古韩国的韩原。所以，韩万的封邑韩原，也是晋国韩氏卿族的发祥地和第一个治邑。

在春秋时代，韩氏势力早期比较衰弱，到韩万的三世孙韩厥开始兴旺起来，但是，在晋国六卿专政的时代，韩氏卿族也还是六卿中势单力薄者。所以，《史记·索隐》的作者说韩氏“事微国小，《春秋》无语”（见《史记·韩世家》）没有留下像其他卿族那样显赫的历史功业。然而，在激烈的六卿兼并中，韩氏终于得以同魏、赵两个卿族一道，先是吞灭了范、中行氏，继而吞灭了智氏，实现了魏、韩、赵三家分晋，发展成为独立的诸侯国；到了战国争雄的时代，韩又与魏、赵并称“三晋”，是屹立于战国之林的七强之一，维持了 200 余年的统治。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司马迁在《史记·韩世家》的后序中

提出这个问题并作了自己的解释。他说：“韩氏之功，于晋未睹其大者也。然与赵、魏终为诸侯十余世，宜乎哉！”为什么呢？按他的说法，那是因为：“韩厥之感晋景公，绍赵孤之子武，以成程婴、公孙杵臼之义，此天下之阴德也。”他指的就是韩厥在震撼晋国的“赵氏藏孤”事件中积下了“天下之阴德”，从此，韩氏宗族便兴旺发达起来。

韩厥号韩献子，是晋国韩氏卿族的奠基人。晋灵公时，赵盾（宣子）专权晋国之政，韩厥被赵盾收养于门下，后又举荐他做了中军司马，居大夫之位，从此登上晋国的政治舞台。晋景公时，晋国由三军扩展为六军，武装力量达到极盛，韩厥被命为新中军将，居于卿位。晋厉公时，晋国由六军缩编为四军，韩厥将下军，仍居卿位。晋悼公即位后晋正卿栾书（武子）死，韩厥代栾书任中军将，位居正卿，执掌晋国之政，直至告老辞退。韩厥在晋国的政治舞台上活跃了近半个世纪，他以其杰出的政治家的魄力和政绩，为韩氏势力在晋国的发展壮大创下了基业；尤其是他在“赵氏藏孤”中的壮烈义举，更为尔后韩、赵联盟，实现三家分晋铺平了道路。

“赵氏藏孤”事件发生在晋景公时代。据《史记》记载，当时，赵盾已死，景公企图铲除久专晋国之政的赵氏势力，于是任命赵氏政敌、晋宗室贵族栾书为正卿，假手于司寇屠岸贾，以“诛灵公之贼赵盾”为名发动了诛灭赵氏宗族的“下宫之役”。在下宫之役中，韩厥与赵氏家族的心腹好友程婴和公孙杵臼一道，巧妙地藏匿了尚在襁褓中的赵盾之孙赵武（文子），演出了悲壮的“赵氏藏孤”一幕。晋景公晚年，又是由于韩厥的计谋和促使，“于是景公乃与韩厥谋立赵孤儿”；“复与故赵氏田邑，续赵氏祀”，从此，赵氏宗族才得以绝而复续。这就是司马迁所谓韩厥积下的“天下之阴德”（见《史记·赵世家》、《史记·韩世家》）。